

中华大智慧

2

ZHONGHUADAZHIHUI

● 圣人 ● 圣书



曾国藩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奉《近思录》
为修身进学之本，终生励行不辍。

近思录

● 曾国藩终生最喜爱的书

朱熹
吕祖谦

【宋】

白文对照
新注新译

查洪德
王卓华
注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华大智慧 2

近思录

查洪德 王卓华 注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2 号

中华大智慧 2

近思录

查洪德 王卓华 注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河南省郑州市中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3.5 印张 6 插页 1295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300 册

ISBN 7-5059-2340-4 / I · 1710 (全三册)定价: 68.00 元

开启东方智慧之门

——《中华大智慧》卷首语

人类又一次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

21 世纪的生存与发展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早在 1988 年，7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 2500 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更多的人则预言 21 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智慧必将而且正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这里所说中华智慧乃指“大智慧”，即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伦理道德精神，包涵人性修养，社会伦常和天道自然观。而纵观几千年儒家文化的流变，堪称中华大智慧精华代表的，则是孔子、朱熹、王阳明三大圣人和他们的著作《论语》、《近思录》（含《续近思录》）、《传习录》三大圣书，是谓千秋相续、尊崇不移的圣学心法。孔子被奉作千古至圣、万世师表，成为传统社会的精神偶像，其语录《论语》则作为东方人的圣经。值得注意的是，《论语》所体现的儒学精神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显示了奇迹，被奉为日本工商业界的“圣经”；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1840—1931 年）著《论语加算盘》，提倡道德经济合一论，成为企业家们的必读书；而以“三神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集团主义）为核心，以家族式公司命运共同体为基本模式的日本式经营所贯穿的正是儒家伦理精神。朱熹是新儒学——理学的集大成者，上继儒家绝续千年之道统，是宋代以后八百年间儒学传统的最权威的解釋者，不仅为包括朱元璋、康熙在内的历朝

统治者所顶礼膜拜，而且他所集注的《四书》等著作也成了科举的准绳；同时其影响遍及整个东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熹的世界观是前现代化时代东方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由他所辑录的《近思录》和清代大儒张伯行辑注的《续近思录》则系统辑录了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的语录，体现了新儒学——理学的全部文化内涵，因而被尊为“六经之阶梯”、“圣学之津梁”，成为近八百年来儒学的入门书，近代大家曾国藩甚至以此为日课，终生研读、力行不辍。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一生武功赫赫，学名昭昭，在朱学衰颓之际，倡导心学，高扬人性，把儒家的内圣之道发展到了极致，至王门后学更带上了明显的近代色彩。其代表作《传习录》更是享誉中外，影响了一代代中、日政治人物和思想家，阳明学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腾飞期的台湾、韩国都被作为精神的源泉和动力。三大圣人、三大圣书的有机联系和不断完善，构成了儒家伦理道德精神的核心，我们称之为中华大智慧。

不可否认，儒家伦理的某些具体内容或历史形态会随时代发展而被淘汰，但是其基本的精神则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永恒的价值，是中华民族甚至包括东方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点。如“仁”的个性修养、“人皆可为圣人”的道德自我觉醒、“心即理”和致良知的人文主义倾向；“礼”的社会伦理纲常，充盈着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伦理道德实践、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庄严而崇高的理想人格使命；以及内蕴着超越的道德精神境界等等。所有这些既在社会整体层面上和个人生活层面上对现代社会提供了精神的原动力，而且对于平衡和稳定现代化进程中的秩序和规范，和谐人际关系，维系敬业乐群的社会共同体，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华智慧的这种现代价值早已为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并且必将在 21 世纪的世界发展中再造辉煌。遗憾的是，沐

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中华大智慧的现代诠释和励行践履还远远不够，从这个角度来重新认识三大圣人、解读三大圣书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我们正是以这样的心情，推出这套《中华大智慧》，愿为世纪之交的人类打开东方智慧的大门。

我们期待着，我们热望着！

前言

《近思录》，这部从问世到本世纪 30 年代火爆了 700 多年的书，近几十年突然被冷落了。它火曾火到极致，清人江永说它：“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盖自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冷也冷到极点，遍查近数十年的文献，除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以及数种中国哲学史辞书上可见简短的辞条外，其它竟无关于此书的片纸只字。自然，这大热大冷，都是由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决定的，同时也与这部书自身的特点有关。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熹 46 岁，吕祖谦 39 岁。吕祖谦从浙江跑到福建，与朱熹会晤。两人在寒泉精舍相与读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的著作，深感四人之书，广大宏博，初学者不易把握。为后学晚进计，他们编订了这本《近思录》。近思者，取孔子《论语·宪问》中“切问而近思”之义，意思是就眼前的问题思考，由近而及远，下学而上达，不废初阶，循序渐进。按朱熹的表述是：“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其实，《近思录》的编订过程并不象人们知道的这么简单。从创始到成书，至少经历了三年以上的时间，中间屡经反复，多次修订。初稿与定稿，相去其远。淳熙二年会晤之后，次年又曾会晤，这次好象是朱熹至吕祖谦处。会谈的内容，即使不能肯定专为《近思录》，起码包括《近思录》。按笔者的考查，《近思录》创始于淳熙二年（1175），定稿在淳熙五年（1178）之后，根据就是《晦庵集》卷三十三所载朱熹给吕祖谦的三封有关《近思录》的信。按《四库全书总目·近思录》提要之说，这三封信分别写于乙未八月、丙申、戊戌，即淳熙二年、三年、五年。

《近思录》的流传，自初稿成后，即已开始，初以抄本流行。朱熹丙申《与吕伯恭》书中谈到：“此本既往，无以应朋友之求假，但日望印本之出耳。”此后当由吕祖谦负责刊行（有关考查见下文）。在朱熹去逝以后，曾学于朱氏之门的叶采，致力于注解《近思录》，积30年之力而成《近思录集解》，于宋理宗淳祐八年成书，十二年，表奏于朝。叶采集解本，使是后人眼中的定本。

此后的700年中，《近思录》一直是一部影响很大的书，元、明、清之大儒，多熟读《近思录》，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宋明诸儒，若何氏基、薛氏瑄、罗氏钦顺，莫不服膺是书。”其实元代诸儒，如金华一派，清代诸儒，如江永、张伯行、尹会一等等，又何尝不服膺是书呢？

《近思录》影响之大，首先表现为刻本之多。其最初刻本，当在定稿之前。今见于《读书附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著录的，均非叶采集解本。而《直斋书录解题》与朱熹《近思录序》，又大不相同，今引于下：《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云：

朱熹、吕祖谦取周、程之书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六百十九条，取“切问而近思”之义，以教后学。

朱熹《近思录序》云：

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因共撮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共六百二十二条。

两者不同有二：一是《直斋书录解题》言不及张载，也即说《近思录》所取为周敦颐与二程三人言论，朱熹序则并张载为四人。这一差别不可简单地指《直斋书录解题》为误。朱熹丙申《与吕伯恭》书中有催促吕祖谦刊印《近思录》的话，说：“横渠诸说，告早补定，即刊为佳。……但日望印本之出耳，千万早留意，幸甚。”将两者联系起来思考，可知《近思录》初稿不录张载语，并

已流传。至于《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是否初刊本（或抄本），则不得而知。以常理推断，吕氏作为中州文献旧家，居浙江为大族，在朱熹如此催促下，不会不很快刊印。但根据朱熹戊戌《与吕伯恭》书，《近思录》又作了修订。故可推断，《近思录》在定稿之前曾有刊本。再一是条数的差别。则既经反复增删，条数变动是自然的，已不必考究。只是与叶采同时的杨伯岩，也有一个《近思录》注本，其条目与叶本有异。今传《近思录》或作 623 条，多出的一条，在第五卷最后，即录自杨伯岩注本。

明清以来的刊本，多到不可历举。其中有影响的，如明正德十四年汪伟刊本（南监本），明稽占斋刊本，清正谊堂本，吕氏宝浩堂《朱子全书》本等。仅进入本世纪到 30 年代这短短的时期中，据我孤陋所短，就有近 10 种刊本。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收注本三种，存目一种，《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国学基本丛书》各收一种。在国外，如朝鲜等地，也有刊本。明正德间，就曾在朝鲜刊行，其奉训郎集贤校理知制教世子左司经臣金汶跋曰：“我殿下思欲广布是书，顾其旧本间有误字，乃命臣汶雠校，命铸字所模印颁赐。”这自然可以说明，《近思录》流传之广了。

《近思录》影响之大，又表现为注家之多。首先，《近思录》有朱熹自注，不过不是成书，而是在讲学或答问中，对《近思录》所录各条基本上都有解说，这些解说，保存在朱熹的《文集》、《或问》、《语类》中，成为程朱后学解说《近思录》的依据。最早的注本自然是上文谈到的叶采集解本和杨伯岩注解本。叶采集解，可以说是元明时期居统治地位的本子，此本曾正式奏朝廷，叶采本人又曾亲承朱熹之绪论，且积三十年之功成此书，用功深矣。这些都是叶本取得统治地位的原因。直到清康熙年间茅星来著《近思录集注》时，仍然“坊间所行者，惟建安叶氏《集解》而已。”（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序》），不能不说是影响

深远了。宋代又有朱熹的再传弟子何基所著《近思录发挥》，但其影响远不及何氏《中庸发挥》、《大学发挥》。其书著录见《千顷堂书目》卷十一及《宋史·艺文志补》。元代则有周公恕（或说明人）《近思录分类集注》，《千顷堂书目》卷十一著录，云：“就叶采集解参错杂折之，非叶氏本书也。”此书遭到清人江永抨击，说：“近世周公恕，分出细目，移动本文，破碎纠纷，或漏落，或妄增，大失朱吕之意。”（江永《近思录集解凡例》）。此书后来几乎失传，今仅有善本存北京图书馆等处，而在明清之间则极为流行。元明时尚有赵顺孙《近思录精义》（《千顷堂书目》），戴亨《近思录补注》、黄绩《近思录义类》（明王圻《续文献通考》）。清人注本，有影响的有江永《近思录集解》，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张伯行《近思录集解》，还有李文炤《近思录集解》（均见《清史稿·艺文志》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永集解本。江永之解，基本上采自朱熹之说，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凡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中其言有相发明者，悉行采入分注。或朱子之说有未备，始取叶采及他家之说以补之，间亦附以己意。引据颇为详洽。盖永邃于经学，究心古义，穿穴于典籍者深，虽以余力为此书，亦具有实证，与讲学之家空谈尊朱者异也。”江永本既出，其流行超过叶本，自成书至本世纪30年代，仅仅百余年中，刊本不下10种。《四库全书》、《四部备要》收入，《国学基本丛书》所收也是江本。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诸子百家丛书》，其《近思录》即抽印《四库全书》中江本。江永集解本如此流行，首先是由于他注解准于朱熹，编次又恢复朱熹原貌。嘉庆十九年（1814）江西藩署刻本、《四部备要》本，都在书名上标出“朱子原订”字样，它适应了人们尊崇正统的心理。其次，江永虽是集他人之解，但不蔓不枝，恰切了当，深见功力。其三是由于它简明而便于阅读。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张伯行《近思录集解》也都功力极深，所以也颇为流

行。茅星来本文字校勘极精，注释又以详明见长，名物训诂，考订援据，根源分明，尤为适于初学者。张伯行本重在解说疏通，深入而又浅出，义理隐微之处，一经点掇，则明白晓畅。阐释义理，是其所长。两书分别被收入《四库全书》和《丛书集成初编》中。注家如此之多，可以看出《近思录》的影响。

《近思录》影响之大，还表现为续书之多。宋代就有蔡模《近思续录》（姚际恒《好古堂书目》），元代有柳贯《近思录广辑》，明代有郭橐《续近思录》、江□□《续近思录》（均见《千顷堂书目》），清代则有汪佑《王子近思录》，施璜为作《五子近思录发明》，江阴何氏有《续近思录》（均见《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郑光明《续近思录》、刘源淦《近思续录》、张伯行《广近思录》、《续近思录》（均见《清史稿·艺文志》三）、尹嘉铨《近思录三编四编》、《近思录辑要》（见《禁书总目》）等。其中以张伯行《续近思录》影响最大，其次为《五子近思录》。有关续书问题，此处不拟详述，仅想借此说明《近思录》影响之大。

《近思录》在旧中国何以能久盛不衰呢？当然最基本、最显见的原因是，它是一部宋代理学的基本读物、入门读物、概论性读物。这些特性，是中国学术史上许多基本的、重要的著作所共有的。避开共性的东西，探寻《近思录》个性特点，则其久盛的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第一，总括濂、洛、关、闽之学，集中体现其精华，为学者提供一个入学门径。周敦颐（濂）、二程（洛）、张载（关），生当北宋盛时，上承宋初三先生之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糅合释、道而三教归一，创立了理学，至南宋朱熹（闽），始集大成，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周、张、二程的宇宙生成论、万物化生论、人性论，以及处己治人等等学说，散存于他们的著作中。初学者面对如此浩繁的著作，必将茫然而不知自何而入。正

如朱熹《近思录序》所说：“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使“有志于学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这是编者的初衷，实际证明他们确实实现了这一初衷。这一编纂目的之所以能很好实现，首先是这部书确实体现了周、张、二程思想的精要，博中取约，而约中又反映了其思想全貌。其次是它不仅反映了濂（周敦颐）、洛（二程）、关（张载）学，更是闽（朱熹）学的集中体现。《近思录》中的周、张、二程之学，原是朱熹眼中的周、张、二程之学。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后序》中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马、郑、贾、孔之说经，譬则百货之所聚也。程朱诸先生之说经，譬则操权度以平百货之长短轻重也。”我们借用这一比喻，那么《近思录》中周、张、二程之语，犹如百货。而朱熹的选择与解说，便是对这百货的权度。这就使得《近思录》成了宋代濂洛关闽之学全面、集中、简明、概括的表述。如果濂洛关闽之学是一座富丽的宫殿，《近思录》便是足以窥知这一宫殿全貌的门，有了《近思录》，便可“得其门而入。”

第二，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各章之间，逻辑关系分明，使读者有脉络可寻，弥补了理学著作散焉而难举的缺陷。宋代理学家，认为文章害道，于是不为辞章，只以语录传道。语录随事问答，自难有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朱熹有一段论为学门径的话说：

六经、《语》、《孟》皆当读，但须知缓急。《大学》、《语》、《孟》，最是圣贤为人切要处，然《语》、《孟》随事问答，难见要领，惟《大学》是说古人为学之大方，体统都具。玩味此书，知得古人为学所乡，读《语》、《孟》便易入。

《论语》、《孟子》的这一缺陷，也同样地存在于周、程、张、朱的著作中。《近思录》的编纂，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为

理学建立一个看得见的逻辑体系，可以说是编者编辑此书时刻意追求的目的之一。这从朱熹给吕祖谦的信中可明确看出。其乙未八月信中说：

《近思录》近令抄作册子，亦自可观。但向时嫌其太高，去却数段（如太极及明道论性之类），今看得似不可无。如颜子论为首章，却非专论道体，自合入于第二卷（作第二段）。又事亲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缓，今欲别作一卷，令在出处之前，乃得其序。

戊戌信中说：

《近思录》数段已补入逐篇之末，今已上呈，恐未有安，即望见教。即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

此处所谓“序”，即逻辑顺序，亦即各卷之间，甚至一卷之中的逻辑关系。由两信可知，编者对其逻辑关系是多么地认真，简直达到了殚思竭虑的程度。后世阅读和研究《近思录》的，也深明于此。今存叶采集解本、茅星来集注本卷前小序，都着意阐发各卷之间，甚至卷中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近思录》中体现的逻辑体系，不仅是此一书的逻辑体系，也是濂、洛、关、闽之学的逻辑体系。这就使得程朱后学，不能不把这部书放到极重要的位置上去。

第三，它是理学甚至是整个儒学深造的阶梯。按朱熹的说法是：“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而前人有直将《近思录》上接六经的，说“学者能读《近思录》，方可以治经。”《近思录》不仅可以使学者入圣学之门，而且还是一个导人步步达于高深的阶梯；不仅具有一个理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而且还有一个从易到难、由低到高的逻辑顺序。请看吕祖谦《近思录序》（或称作题词）：

《近思录》既成，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

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蹴等陵节，流于空疏，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耶？览者详之？

按吕氏之说，《近思录》当从第二卷读起，最后返回来读第一卷，这就是它的“科级”。而到通得第一卷，明于“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对于理学，已可谓知其高者远者了。叶采《近思录集解序》也称，此书“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体用兼备，本末殚举。”“盖时有远近，言有详约不同，学者必自近而详者，推求远且约者，斯可矣。”

尽管从孔孟到二程，他们的原著本身没有也不曾考虑过难易顺序问题，但他们的教学理论与读书理论，却都十分强调循序渐进，学不躐等。《近思录》有“关于大体”者，有“切于日用”者，由下学而至于上达，阶梯分明，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理论。这里有两点应该特别指明：其一，他们强调循序渐进，实是强调下学功夫，要求学者就切身日用处下功夫，不废初阶，不陵节以进，不可“厌卑近而骛高远”。所以《近思录》于读书之法，齐家之道，出处之义，处事之方等等，谆谆不倦，正是此义。其二，这种对下学功夫的强调，乃是针对言性命之学者空疏之病而发。赵氏《近思录跋》就曾说，学者读《近思录》，“不惑其途路，则千里虽远，行无不至矣。”“不然，徒高远其言，诡异其行，俾世之人咸共指目曰：‘道学云云者’，则甚非朱吕所以为书之意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以为吕祖谦《近思录序》：“其言著明深切，尤足药连篇牍，动谈未有天地以前者矣。”就这点说，《近思录》又是一剂疗治道学千年空疏顽症的良药。甚至在今天，对于高谈传统文化的人，仍不失针砭之义。

此外，《近思录》采取类辑的方式，也适应理学家提倡的自

我体会的学习方法。程朱治学，反对解说，强调学者的内心体认。如《二程遗书》卷十八载：学者问仁，程颐说：“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又卷十五载程颐语：“说出必非古意，转使人薄。学者须是潜心积虑，优游涵养，使之自得。”《近思录》将同一问题不同人之说，同一人不同时之说，类聚一处，各说或互相发明，或互相补充，或同中有异，或似异而同，便于读者自己“体认”。所以朱熹说：

《近思录》文字，初乍看也是难，有时前面恁地说，后面又不是恁地。这里说得如此，那里又却不如此。仔细看来看去，却中间有个路脉。推导得四五十条，又却只是一个道理。

这就是读《近思录》而自我体认的过程。这种注重内心体认的学习方法，是由理学认识论决定的，也适宜于学习理学学说。即使今人学习古代文化，也应采取这种方法。这也是《近思录》长期流行的原因之一。

《近思录》近几十年被冷落，自然也是社会与它自身两方面的原因。但近十几年来，宋明理学的研究越来越热，有关周、程、张、朱的研究文章，随处可见，但仍无人谈及《近思录》，一般“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或竟不知其名，这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由于《近思录》不过是部类抄，自有原书可读，而不屑于谈它吗？但就我所知，《近思录》所取之书，如张载《横渠文集》、《论语说》、《孟子说》、《礼记说》，均已散佚，《文集》唯存《文集抄》一卷。即使今日尚存的，如《二程遗书》、《二程外书》，《近思录》中所录，有多条不见今本。仅此文献价值，似亦不可忽视。就此不能不说，周、程、张、朱研究之热，似乎仍热在表层。又有一个深层的原因：今天的研究者所关注的，乃是宋代理学的某些理论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后世、对今天有什么影响，或说在今天还有什么价值。研究这些问题，似乎考查原著足矣，不必去管《近思录》。但如果深入研究周程张朱之学的总

体，要了解其逻辑结构，则是否可以仍不借助于《近思录》呢？当然，《近思录》已不可能再度成为家喻户晓、士子必备的书，因为程朱之学，毕竟已经不再是一般读书人的学问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近思录》的出版说明中曾说：“《近思录》是‘研习理学之入门津梁，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预示着，《近思录》将重新受到社会的重视。

这次译注，以江永集解本为底本，文字校勘，主要参校茅星来集注本，也参考了叶采本与张伯行本，随校随改，未出校记。注释重在指明语言出处或理论渊源，有义理难明者指明义理。有关义理阐释，尽可能借助朱熹、叶采、茅星来、江永、张伯行等旧解，旧解无法借助则自加解说。不作辞语注释，更不疏解文意，文、辞之意可于译文中见之。释译不是字句对译，以明理为准。此本共623条，多出的一条，乃前人录自杨伯岩本，即第五卷最后一条。卷六原有“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一条，清代张伯行删去，换成了“今人多不知父母之爱”一条，今从张伯行本，为保持旧貌，将“饿死事极小”一条录入注文。每条都查出具体出处注于条下，前人注错出处的则改正，今本不见的则于注中指明。为读者阅读和研究方便，书后附录了有关研究资料。王卓华君又将张伯行《续近思录》加以标点，与此书合订出版，正续二录，系统地反映了宋代五大儒的思想精粹，体现了中国新儒学奠基时期的全部文化内涵，也就是封建社会后期七百年间尊崇不移的圣学心法。

所有这些工作，有谬误或不当处，幸望读者校正。

目 录

前 言	
卷 一 道 体	(1)
卷 二 为学大要	(39)
卷 三 格物穷理	(113)
卷 四 存 养	(169)
卷 五 改过迁善 克己复礼	(214)
卷 六 齐家之道	(243)
卷 七 出处进退辞受之义	(261)
卷 八 治国平天下之道	(289)
卷 九 制 度	(313)
卷 十 处事之方	(341)
卷十一 教学之道	(380)
卷十二 改过及人心疵病	(396)
卷十三 异端之学	(414)
卷十四 圣贤气象	(431)
附录一	(454)
(一) 序 跋	(454)
(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近思录》	(459)
(三) 茅星来《附说》辑评	(462)
(四) 叶采集解本各卷小序	(463)
(五)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近思录》	(465)
附录二 续近思录	(466)